

路在何方

张志良 著

辽宁大学出版社

路 在 何 方

张 志 良 著

辽宁大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一·沈 阳

责任编辑 刘东杰
封面设计 邹本忠
责任校对 马淑清

路 在 何 方

张志良 著

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）

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 字数：60千

1991年3月第1版

199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00

ISBN 7-5610-1234-9
I·195 定价：1.40元

（辽）第9号

序 言

本书的主人公徐敏军，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，黑龙江省富锦市兴隆镇东明村党支部书记。他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。他，有崇高的理想，有感人的事迹。

——他有坚定地共产主义信念。他以他现实的模范行为，雄辩地证明了他的崇高理想，恰如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所说：“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利益而斗争，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，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。”

——他牢记党的根本宗旨。他致富不忘乡亲，自己富了，全村人也都跟着富了，使东明村成为大富、快富、共同富裕的典型。

——他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。他以他的无私奉献精神，为我们党增添了光辉，为促进党风的根本好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——他有胆有识。他在困难面前不低头，在荣誉面前不伸头；他敢于同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高低。

徐敏军这个先进人物，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涌现出来的，因此它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我们要很好地学习他的精神，推广他的经验。我们渴望各项事业蓬勃勃，兴

(77)	 翰海新琳代母
(08)	 好菜 “义笑新画”
(88)	 目 录 好已明

闯关东.....	(1)
中国农民在寻路.....	(4)
解开了身上的绳索.....	(10)
农民的理论.....	(13)
大伙儿都盯着他.....	(18)
向前冲与往后退.....	(21)
路在脚下.....	(26)
水中捞月.....	(31)
富在深山有远亲.....	(36)
把钱攥出了水.....	(43)
超过了美国农场主韩丁.....	(50)
还不是坐小车的时候.....	(58)
为什么一定要生个男孩呢.....	(62)

随 笔 五 则

“吃饭为了活着”与“活着为了吃饭”.....	(71)
“为富当仁”辩.....	(74)

闯关东

一九六七年，二十岁的徐敏军，要闯关东了。

他家住在山东省胶南县海青乡狄家河村。这个村庄，每人才一亩多丘陵山地。土地贫瘠，兔子不在这里拉屎，老鼠不在这里打洞，每年只能种点地瓜、花生，难以糊口。希望在春天里播种，贫困在秋天里来临。偏偏是越穷越生孩子，越生越穷。那时也没有计划生育，徐敏军的母亲一连串生了六个大小子。几亩薄田怎能养活这八口之家呢？徐敏军是老大，很懂事理，十二岁就下地干活了。在他幼小的心灵上，蒙生着幻想，眼前有大片大片土地多好啊！

岁岁月月，徐敏军伴随着土地成长，现在已经是棒棒的小伙子了。可他，并不象人们想象的粗壮的山东大汉。一双俊俏雪亮的眼睛，炯炯有神。他只念过四年书，可懂得的世理不算少。虽然处在弱冠之年，却没有一点稚气。他立志要到遥远的北方，寻找大片土地……

徐敏军要闯关东的消息，在村子里不胫而飞，乡亲们又喜又忧。有的说：“那北大荒冷得象个冰窖，三九天能冻掉耳朵；”有的说“他家儿子多，闯一闯也好！”

儿行千里母担忧。最舍不得徐敏军的是母亲，她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背着儿子偷偷地抹去着伤心的泪水。

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此事古难全。徐敏军劝

慰了母亲，告别了乡亲，怀着依依惜别又充满希望的心情，离开乡土，踏上了从济南驶往佳木斯的列车。

列车飞快地向前。此刻，徐敏军的心绪很不平静，仿佛他的心也跟列车一样，在颠簸，在奔放。沿途，他看到了许多繁华的城市，恬静的村庄，宽阔的平原，涛涛的江河……。他目不转睛的贪婪地观赏着祖国的壮丽河山。他高兴得从母亲给他的那大包里，抽出一张煎饼啃了起来。

突然，车厢里一位旅客操着山东腔说道：“咱这盲流，到底往那里流呢！”另一位唉声叹气：“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，早晚能有个头。”

在那“史无前例”的日子里，生产日趋下降，生活没有保障，不少人离乡背井，出走谋生，步入了盲流的行列。

徐敏军听了两位“盲流”的对话，自己刚才那股满腔热情一下子凉了半截，下意识地低头低了下来。

但是，车厢里的盲流，何止一人、二人，足足有半节车厢。有的是单身出走，还有举家北迁的。他们为自己吃不上饱饭而苦闷，为自己的命运而奔波。

历史上的移民运动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若仔细探究，这种移民运动无论是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，还是有迹可寻，有规律可遵的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从贫穷到富裕，从荒岭到沃野，从人满为患到地广人稀，人口流动基本是顺向的、合理的、科学的，赋有进步的历史意义。

然而，由于时代的不同，制度的不同，流浪者的命运自然也大相径庭。

旧社会的流浪汉们，为了躲灾荒、避战乱，不得不逃往他乡。他们的命运象一只漏底的小舟，在茫茫沧海里飘荡。出于求生的本能，他们往往怀着最后一线希望，不畏艰辛地赶

赴那梦想的世外桃源。由于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最后的结局是落叶难归，骨埋异乡。

一切都在变化之中。水在流动，车在流动，人也在流动。徐敏军想在地广人稀的北大荒，用自己的双手开辟新天地，用自己的汗水换取粮食，这对国家有益，对个人有利，有什么可责难，有什么不体面呢！徐敏军想来想去，心安理得，理直气壮起来。

列车隆隆北上，他躺在座席底下，从梦中醒来，双眼睁得亮亮的，眼神中充满了激情，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。

佳木斯车站到了，列车象一条驯服的黑龙停了下来。

中国农民在寻路

佳木斯，是祖国东北边境上的一座新兴城市，当时市内人口三、四十万，街道整洁，楼房栉比，人烟阜盛。早在一千年前，契丹族在这里建立了王朝，汉、满、朝鲜、赫哲、达斡尔、鄂伦春等三十多个民族在这里和睦相处。解放战争时期，这里是东北主要革命根据地，曾被誉为“第二延安”。这块方圆七万平方公里的三江平原，相当于比利时国家领土的两倍，已开垦的耕地面积仅二千多万亩，农业人口不足二百万。

徐敏军在佳木斯下了火车，无心观看这北国城市风光，他的心思全在土地上。那大片的土地，无际的荒原，不时闪现在他的眼帘，恨不得插上翅膀，一下子飞到那无垠的平原上。

又经过两天的旅程，风餐露宿，徐敏军终于到达了富锦县（现改为市）兴隆乡（现改为兴隆岗镇）落脚了。

他落脚的地方是在兴隆岗镇西南三十华里的东胜村。这是个小小的村庄，散落着几十户人家。周围是一片草甸子，常年长着芦苇、野草。地面凹凸不平，凹的地方水深一、二尺，有鲫鱼、鲶鱼、黑鱼、狗鱼等繁衍；凸的地方有豺狼、野猪、黑熊等猛兽横行。虽说这里是个荒凉的地方，却也多姿多彩。蓝天、白云、绿草、青山，令人流连；雁鸣、蛙

叫、狼嗥、虎啸，还保留着大自然的原始景象。昔日野兽在这里聚集，雁鹑在这里棲息，土匪在这里藏匿。

解放以后，人民政府在这一带肃清了土匪，逐渐有移民在这里定居，拓荒耕田。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，这里建立了生产大队。

徐敏军找到了大队党支部分书记王立顺。王立顺见小伙子长的不赖，少言寡语，老实厚道，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，关切地说道：“只要你吃得起辛苦，就在这里干吧！”

老书记的一句话，给徐敏军吃了定心丸。他不再是“盲流”，而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了。

有耕必获，无地非春。徐敏军思念土地之情，犹如思念母亲一般。他当天就走出村外，在地里仔细观察土质。这里的土地，油黑发亮，他用手攥一把，好象从指缝里直滴油，仿佛他握的不是土，而是油，是粮食，是黄金……。徐敏军浸沉在遐想之中。他渴望的土地，今天终于得到了。他心花怒放，第二天一早，就急切地下地干活了。

这条山东汉子，以他辛勤的劳动，正派的为人，卓越的才能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，不久便当上了生产队长。

一九六九年，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地的知识青年，陆续到这里插队落户，徐敏军像当年支部副书记王立顺关照自己那样热诚为他们安排吃的、住的、玩的。青年们一个个活蹦乱跳的，一边干活儿一边唱起歌来。

知识青年们总是多读了几年书，懂得的事情多，而且思想单纯，不懂的事儿，看不惯的事，爱刨根问底：

“队里的劳动力有强有弱，劳动态度有好有差，效益有高有低，一天都挣十个工分合理吗？”

“出工一大帮，干活懒洋洋”，这种生产方式不能改变

一下吗？

玉米饼子白菜汤，一天三吨不变样，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贫困吗？

“我们的活计没少干，至少一天能挣三元多，怎么只分给我们几角钱，回家的路费都不够，能不能多分点？”

生产队每年打粮几十万斤，只留下几万斤口粮，劳动报酬也是这样，劳动力只能分到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几，多劳不能多得，谁还有积极性呢！

这些话都说到徐敏军的心里。他觉得，他这个生产队长只有安排社员干活的权力，没有分配劳动报酬的权力，实在不好当。知识青年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令他同情，也令他费解。

就在这当儿，徐敏军的大儿子出生了。全家人住在一所破旧的小房，屋子四面透风，眼巴巴的扭着把孩子的脚冻肿了。妻子杨怀兰，是山东省五连县冯家庄人，虽说与老徐不是一个县的人，可两个村庄仅隔八里地，他们俩的婚事，先是双方父母撮合，后经俩人同意的，既顺了老人的心，也合了自己的意。怀兰到北大荒来，月子里没有吃上鸡旦，也没有吃上细粮，老徐打心眼里难受，觉得对不起她。日子怎么老是过得这样寒酸？是自己没能力，还是命中注定呢？土地少，不够吃，想得通；土地多了为什么粮食还不够吃？现在农民在政治上不受压迫，经济上不受剥削，照理应当富得快些。为什么队穷，家穷，人穷？穷，绝不是社会主义。徐敏军以自己的朴素感情，觉得似乎有一股什么力量在跟农民作对，一些政策和规定，不符合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，但一时又找不出症结来，心里憋的荒。他带着一连串的问号，走到老书记王立顺家里。

王立顺是位一九四七年入党的老党员，在战场上流过血、立过功，复员后本来可以留在城里捧上铁饭碗，却毅然回到了农村。他倔强。凡属不合理的事，不管你是谁，他都敢顶。他心热。谁要有了困难，他都挂在心上。他无私。从不为个人的事向党伸手。在徐敏军眼里，老书记像块无瑕的碧玉，放光的真金。他敬重老书记，佩服老书记。

面对老书记，徐敏军倾述了自己的肺腑之言：我们队今年人均产小麦二千多斤，只许我们每人分二斤，余下的全是玉米，这公平吗？再说、每个劳动力实挣三元多，只分六、七角钱，多劳不能多得，这太不合理了。老书记听后叹了一口气：“这事我也想不通，提起来谁都生气，可上头又不给作主，我有什么法子？”徐敏军乘势又说了一句：社员希望多分点细粮过春节，知识青年要求多分点钱回家作盘缠，反正法不责众，我就做主了。你看行吗？老书记没有吭声，他默许了。

徐敏军高兴地回到队里，决定给每人分90斤小麦、每个劳动日增加三角钱。消息传出，社员们拍起了巴掌，知识青年们直蹦高，徐敏军却乐在心里，那股痛快劲就不用说了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一天，几个面孔严肃的人来到村里追查“私分粮”、“私分钱”的事儿，一时间闹的全队天昏地暗，大人小孩不得安宁。来说，王立顺不承认错误，就要撤掉他支部书记的职务，多分的粮和钱都要退回去。这股风刮得好厉害呀，一下子吹散了全村人脸上的笑容，吹垮了社员们生产的劲头。

人们总得活下去，而且想活得好些。生产队的干部不甘心群众过苦日子，便搞点多种经营，种上了小豆、绿豆、糜

吊，又遭到了批判，说这是“向钱看”。临近的一个生产队，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，香瓜籽还没有下种，就被逼得把种子挂在队部的房梁上，要干部和社员每天看一遍，不许香瓜籽落地生出资本主义尾巴。一个小青年在河沟边开了又窄又长的两根垄、种上了豆角，栽上了茄子，被上边来人发现了，当即遭到批判：“看你这资本主义尾巴都伸到哪里去了”！小青年不服气地说：“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，自己种点菜还犯法吗？要把我们饿死咋的”？这沟边的菜，硬是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砍去了。生产队和社员为求生计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被捆得死死的。社员和基层干部们百思不解

“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吗？”

徐敏军也象全国亿万农民一样，对这些极左的做法想不通。特别是把他们的多劳多得说成是“私分”，是资本主义道路，更想不通。

老书记王立顺凭他的觉悟，靠他的党性，本能地对现行的极左路线和政策产生了抵触情绪。他不但拒绝检讨，而且认为徐敏军做的对，公开地站起来支持。上边恼火了，给他扣上了“反党、反社会主义”的帽子，还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老书记气急了，声明退党。

这是一场激烈斗争。是农民、党员、基层干部对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公开抗争。

小胳膊扭不过大腿。斗争的结果，老书记被撤了大队干部的职务，极左政策依旧推行。大家辛辛苦苦干一年，依然是队穷、家穷、人穷……。

无情的现实，像暗淡的帷幕，降在徐敏军面前。他数夜未睡好觉，想起了当年闯关东的激情，想起了父老兄弟送行时的期望，还有那时刻要踏出新路的决心，面对残酷的现

实，都落空了。再往前走，路在哪里？

.....

徐敏军在寻路，中国农民在寻路。

“中国是农业大国，有史以来，上下几千年，纵横十万里，主要是农民在艰辛地走着这漫长的道路。中外许多社会科学家早就提出，“中国的道路，实际是中国农民的道路。”

在这农业大国里，矛盾相当纷繁，而最要害、最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土地与农民怎样结合。

远古时代，民间争颂击壤歌，歌颂土地，狂傲高呼：“帝力于我有何哉？”意思是皇帝能给我什么？他们为何如此自得？那是因为，这时的农人紧紧依偎在大地母亲的怀抱，皇帝的权威一时也奈何不得。不妙的是好景不长，尧、舜、禹过世后，土地的多寡便成了权力和财富大小的象征，贵族们掠夺和霸占土地，并以此做为奴役和盘剥他人的资本。于是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延续了二千多年。

不过，中国农民最终还是幸运的。当时代的车轮艰难地碾到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，黑沉沉的神洲大地闪出亮光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打土豪，分田地，土地还家，广大农民得到的利益是实实在在的。这些已铭刻史册。

但是，历史似乎总在捉弄耕耘者，土地还家没几年，一些人总想把车轮推得更快一点，从单干的“独木桥”，到初级社的“木板桥”，再到人民公社的“金桥”，几年功夫，爬了好几个阶梯，快得让人头晕目眩。于是导致超负荷，车轮倾斜。超越时代，超越生产力的水平，过早促成的“自由人的联合”（马克思语），使庄稼人和“一大二公”的土地分了心，自然路越走越窄，直至走上了穷途。

解开了身上的绳索

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1977年，中国天空上的乌云顿时消散了，“四人帮”垮台了，十年动乱史宣告结束了。但是，中国农业怎样发展，农民的路怎样走？一时还是迷惘的，徐敏军想，这路应该越走越宽，步子应该越迈越大才是。

1978年12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，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》。这公报，象看透了老徐的心思，句句合乎他的心愿。徐敏军痛快极了，把三中全会公报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还不舍得放下。

公报中说：“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，把农业尽快搞上去，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，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”；“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，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，克服平均主义”；“社员自留地、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，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。”

国家还同时规定，粮食统购销售价格从年夏粮上市时起提高百分之二十，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。

徐敏军把三中全会精神吃在肚子里，记得牢牢的。他最感兴趣的是，生产队有了自主权，可以按劳分配了。

此时，徐敏军的家已搬到东明村。

东明村是东胜村新分出来的一个自然村，作为独立核算小队，共三十多户人家，多数是关内来的移民，家底较薄。徐敏军在这里当队长。

徐敏军回村后，当即把社员召集在一起，传达、学习三中全会精神。徐敏军说：“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，把农业尽快搞上去，还要实现农业现代化。”徐敏军话音刚落，社员们就七咀八舌议论起来。有的说：“这回可好了，咱们多劳可以多得，再不怕给我们扣上什么资本主义帽子了。”

农民最痛恨资本主义，也最怕把富了当成资本主义去批。

会上，许多社员争着说：“党中央盼着我们富，我们就多开些荒地，多打些粮食，再搞些多种经营，不就富了吗？”

“四人帮”的时候，谁开荒就要割谁的资本主义尾巴，现在不用怕了。

多数社员在会上提出：“中央关心咱们农民，又给粮食提了价。咱们钱多了，不能都分光，留下一半买拖拉机。”

过去，一提起农民，有人总认为他们是小生产者，落后、愚昧，缺乏远见，可今天东明村农民，却表现得聪明、理智、果敢。东明村农民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照耀下，就像解开了束缚多年的绳索，身子骨轻松了许多，一个个都来了精神头。

徐敏军在会上直接了当地说：“我们农民都稀罕土地，可没有机器不行，只有实现了机械化，才能多开地，多打粮。就照大家的意见办，各家少分点，把钱集中起来买拖拉机。”

从1979年到1981年，徐敏军带领全队社员，齐心协力，连续大干了三年。仅仅三年，置下了大、中、小型拖拉机七

台，新开垦一千五百亩良田，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，粮食产量也增加了一倍，劳动力人均收入翻了两番，由三中全会前的五百元，猛增到二千多元。

东明村的农民富了，远近闻名。花香招蜂蝶。供销社要在这儿设立门点，中心校要在村里开设民办小学，邻村的姑娘们愿意跟这里的小伙子搞对象，……这好事，一桩桩送上门。春节那阵子，家家杀猪宰羊，户户贴上了大红对联：“政策顺心化春雨，汗水落地变金山”，“同走幸福路，共享太平年”，还有那“五谷丰登”啦，“猪羊满圈”啦，……全村子红红火火，热热闹闹。

1982年，兴隆乡遭内涝，各村普遍减产，而徐敏军领导的东明村，却喜获丰收，麦子、黄豆，大车小辆的往国家粮库里拉，整整送了六十万斤，竟占了全乡卖粮总数的五分之一。

这一年，徐敏军这个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，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儿子，在鲜艳的党旗下，举手宣誓，庄严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他成了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的光荣一员。

1983年，徐敏军由中共预备党员转正不久，担任了本村党支部书记。原来受“四人帮”迫害的那位老书记王立顺，被平反，恢复了党籍。王立顺已经年过半百，他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35岁的徐敏军身上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当支部书记合我的心。记住，为大家伙着想的事，多时都没有错，好好干吧，这地方有干头。”兴隆乡党委也找徐敏军谈话，要他一言一行按照党章办事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做一名模范的共产党员。

上级党组织的教导，老党员的嘱咐，徐敏军都铭刻在心。